

从中国到荷兰

From China to the Netherlands

荷兰华人社区的多元化发展

2026 年 2 月

荷谓自由基金会 (Helan Digest Foundation)

受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t) 委托



目录

目录	2
前言	4
摘要	5
1. 导言	7
1.1 项目背景	7
1.2 报告结构	7
2. 对话会议的工作方法	8
2.1 参与者的招募	8
2.1.1 招募过程	8
2.1.2 对话会参与者情况	9
2.1.3 研究伦理	9
2.2 深度民主作为一种促进方法	10
2.3 对话实践	10
3. 四次对话会议的主要发现	11
3.1 参与者对荷兰华人社区的看法	11
3.1.1 社区之间互动较少，甚至关系紧张	11
3.1.2 荷兰华人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	11
3.1.3 政治参与	13
3.1.4 新移民网络的出现	14
3.2 歧视和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	16
3.2.1 个人生活中遭受歧视	16
3.2.2 教育机构中的歧视和不平等	16
3.2.3 工作中的歧视和不平等	16
3.2.4 系统性忽视和缺乏支持	17
3.3 社区面临的挑战	17
3.3.1 语言和文化障碍	18



3.3.2 缺乏心理/精神健康系统的支持	19
3.3.3 获取社会服务的障碍	20
4. 结论.....	1
5. 建议.....	1
附录 1 社区内不同群体的说明.....	3



前言

本报告由荷谓自由基金会 (Helan Digest Foundation, 简称 HD) 撰写。该基金会旨在组织和促进荷兰华人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关注和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相关方）就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荷谓自由基金会是一个年轻的基金会，于 2021 年成立并组织会议、讲座等社会活动，以提高其在荷兰华人社区的知名度和网络，覆盖多元化的受众。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荷谓自由基金会受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t, 简称 SZW) 委托，在荷兰华人社区举办了四场对话会，旨在通过对话会深入了解社区当前的发展情况。

本报告呈现了这些对话的成果。由于对话参与者的背景和观点仅代表了荷兰华人社区整体状况的一部分，本报告的研究结果也仅适用于这部分参与者。附录 1 进一步描述了这部分参与者的构成。这个扩充并更新的版本中纳入了其中一场对话中与会者分享的关于中国当局在荷兰的影响及其自身的经历。

对话会举办以后，我们也很高兴地获知，参与者们感受到了这项活动对他们自身的积极影响。我们感谢每一位对话参与者。此外，我们还要感谢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对这个项目的启发与支持。



摘要

《从中国到荷兰》报告由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委托荷谓自由基金会撰写。本报告呈现了荷谓自由由于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5 月,组织的四次与荷兰华人社区成员的对话。

组织这些对话会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 2015 年, 吕特一世内阁重申了《少数民族政策磋商法》, 该法案取消了自 1997 年以来持续开展的、以“全国少数族裔磋商会”(Landelijk Overleg Minderheden, 简称 LOM) 形式与少数族裔社区进行的结构性接触。其二, 荷兰华人社区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 其内部结构与动态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希望通过对话会议深入了解社区内部的最新发展。最后, 与荷兰华人社区进行更多结构性接触也可以提高这些社区在荷兰社会的可见性与知名度。

1, 对话参与者

参与者在年龄、移民荷兰年份、性别、首选语言、职业、族裔和出生地等方面分布较为多元, 其中一类群体所占的比例偏高: 女性、过去 15 年内移民的移民、45 岁以下的移民以及高学历移民。

由于全国少数族裔磋商会停止后, 荷兰社会中少数族裔的结构性接触和可见性降低, 可能不太为人所知。本报告将深入探讨少数族裔中的华人社区。

鉴于荷兰华人社区的多元化, 我们认为, 荷兰政府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同质的群体。政府在处理华人群体问题时, 需要注意这种差异。

2, 普遍情绪

参与者认为, 他们属于多个不同的华人群体, 彼此之间缺乏结构性互动。一些参与者还感受到不同华人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参与者的观察, 并非所有政府机构都意识到这些紧张关系。参与者强调需要加强群体之间的连结和对话, 以弥合这些差异。他们也认识到各个群体之间存在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 并在对话中深入讨论了这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荷兰华裔社区成员的政治参与度被认为较低。然而, 参与者指出, 尤其是在新移民群体中, 更广泛的社区连结正在兴起。

荷兰华人社区普遍遭受歧视和排斥, 参与者表示, 荷兰缺乏具备跨文化素养

这影响了参与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参与者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语言障碍和歧

视是参与者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面对的两大持续挑战；语言和文化差异仍然是他们融入荷兰社会和获得社会服务的重要障碍。但是，他们获得的应对歧视的支持非常有限，阻碍着荷兰华人社区融入荷兰社会。这些都需要不同层面的更多支持和应对措施。

3. 建议

报告建议，政府与这些社区建立结构性联系；推动提高社区自力更生能力的举措；采取措施减少歧视和语言障碍；为了帮助移民克服语言障碍，创办独立的中文媒体，以便移民能够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这些建议侧重于解决荷兰华人社区面临的紧迫问题，提高不同华人社区的韧性，并促进它们与更广泛的荷兰社会之间的联系。

1. 导言

1.1 项目背景

荷兰华人社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却通常被视为与荷兰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上一次关于荷兰华人社区的总体报告发布¹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此后，华人社区变得更加多元化，其内部结构与动态也经历着变化。自 2015 年废除全国少数族裔协商机制以来，荷兰中央政府与这些社群之间不再进行结构性接触。这些社群当前的心态、趋势和发展、以及对社会和政治的关切相对而言鲜为人知。此外，中荷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与中国相关的社区。

为了进一步了解荷兰华人社区，加强政府与社区的联系，荷谓自由在过去一年中代表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组织了四次与荷兰华人社区的对话。

1.2 报告结构

本报告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章介绍了组织对话会议所使用的方法。

第三章总结了对话环节参与者分享的经验、观点和建议，探讨了参与者自身的看法，并列出了参与者针对现有问题提出的可能解决方案。

第四章是基于参与者分享的观点与共有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最后，第五章就未来如何有效地与荷兰华人社区进行接触以及如何解决紧迫问题提出了建议。

¹ 参见 2011 年社会文化规划办公室报告《荷兰的中国人》
<https://repository.scp.nl/bitstream/handle/publications/676/Chinese%20Nederlanders.pdf?sequence=1>

2. 对话会议的工作方法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荷谓自由共组织了四场对话会议，涵盖歧视、身份认同、工作和语言障碍等不同主题。对话会包括两场听众广泛、参与人数众多的全体会议，以及两场以专题小组形式举办、参与人数较少的小型会议。

2.1 参与者的招募

为了使对话环节的参与者群体尽可能多元化，我们采用了多种招募渠道。参与者的招募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新闻通讯等互联网渠道进行；另一方面，我们还向由会员、志愿者、新闻通讯订阅者和合作组织发送个人邀请。

值得注意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滚雪球抽样²，因为最初感兴趣/受邀的人也会将邀请转发给他们自己的人脉网络。这导致某些群体（即最初受邀者中志同道合的人）的占比偏高。当然在招募过程中，荷谓自由也特别关注了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例如年龄、移民年份、性别、偏好语言和职业等。在研究伦理方面，参与者已通过签署知情同意书充分了解其（个人）数据的使用、共享和保护，并表示他们同意为此项目提供（个人）数据。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De Algemene Verordening Gegevensbescherming），整个项目期间的保密性均得到严格保障。

2.1.1 招募过程

荷谓自由的招募对象是其日常工作领域所覆盖的范围较小的社区，包括 2000 年之前来到荷兰、主要在餐饮业工作或曾经在餐饮业工作的第一代移民；其后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近年来新抵达

² “滚雪球抽样”是一种抽样技术，研究人员首先从小群初始参与者开始，然后指定目标人群的其他成员，并重复此过程以获得更大的样本。这种方法对于覆盖难以接触或隐藏的人群尤其有用，但可能导致偏差并限制代表性。

荷兰的学生与高技术移民；从中国被收养的荷兰华人；来自港澳台、维吾尔、西藏等地区和少数民族裔的移民；难民等。

荷谓自由还邀请了特定领域的专家，例如研究中国餐饮业或移民工作条件的研究人员，以及在心理健康问题方面经验丰富的有资质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此外，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还邀请了市政雇员和警察等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向参与者提出问题，以补充参与者的个人经历和观点，从而增强了多样性。

2.1.2 对话会参与者情况

总体而言，参与者群体较为多元。参与者的年龄、移民年份、性别、首选语言、职业、性取向、出生地和族裔身份各不相同。然而，在第一、二和四次对话中，某些类别的代表比例偏高：女性（69%）、过去 15 年内来到荷兰的移民（76%）以及 45 岁以下的移民（84%）。参与者的职业多种多样，包括学生（20%）、活动家（16%）、商业和金融服务业（15%）、科技行业从业者（12%）、教育（教师）和研究人员（11%）。酒店、文化、医疗保健和公共部门等其他行业也有代表，但各占不到 5%。

2.1.3 研究伦理

沟通在招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开招募文本的撰写经过了慎重考虑和仔细修改。关于中国影响力的话题，荷谓考虑到了参与者的安全问题，在邀请函中避免了出现政治敏感词或敏感表述。此外，荷兰华人社区对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代表官方参与对话会在安全、社群形象、会议效果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有时不愿在官方面前畅所欲言。因此，招募过程中，清晰地介绍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的定位是作为荷谓自由在的合作伙伴，显著打消了潜在参与者的顾虑，四次对话会议均招募到了数量充足的参与者。



2.2 深度民主作为一种促进方法

对话环节采用了“深度民主”方法³。这种方法促进了包容性，放大了少数群体的声音，鼓励在小组对话中产生同理心。“深度民主”至关重要，因为荷兰华人社区的成员不习惯这样的对话，他们经常进行自我审查，并且对权威心存疑虑。

所有访谈员均接受过“深度民主”方法的培训。访谈员根据语言能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小组。他们必须精通以下一种或多种语言：普通话、粤语、英语或荷兰语。每个对话小组都安排了一名记录员，负责记录会议内容。

2.3 对话实践

对话环节遵循结构化的日程安排。每次对话都以全体会议开始，HD 和 SZW 的成员在会上进行自我介绍并欢迎大家。对话开始前，对话访谈员确保所有同意书和预评估表均已签署，并解答所有疑问。后评估表在对话结束后填写并收集。每次对话持续约 3.5 小时，并以总结性全体会议结束，各小组在会上分享各自的关键见解。

每次对话结束后，访谈员和参与者都会共同审阅记录员的记录笔记，以确保准确呈现讨论内容。活动前后均收集评估表，以评估预期和体验。每次对话结束后，荷谓都会举行员工和志愿者会议，评估反馈意见，并讨论在流程、引导和研究伦理方面的改进。

³ 深度民主”（Deep Democracy）是一套结构化的团体对话与决策引导方法，强调在形成决定之前主动听见并处理少数/边缘观点，将其关切转化为风险提示与改进方案，从而提升共识质量与执行力。

3. 四次对话会议的主要发现

本章总结了对话环节参与者的经验、观点、知识和建议，描述了对话环节中参与者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荷谓自由根据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将在第四章中呈现。

3.1 参与者对荷兰华人社区的看法

本节根据对话环节参与者的意见进行总结，提供了参与者对荷兰华人社区组成以及这些社区内部变化动态的看法。

3.1.1 社区之间互动较少，甚至关系紧张

“我们在当地很亲近，但在外面就不亲近了。”（参与者谈及彼此的接触）

一些参与者认为，来自中国的移民经历了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最初，这个群体主要由来自香港和浙江的第一代移民组成，他们在餐饮业工作。近几十年来，技术移民和学生等新移民人数日益增长，已成为华人移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者列举了由中国的不同移民群体创建的不同组织，例如中国企业家协会、书法和武术俱乐部、基督教会和女权组织，LGBTQIA+等亚群体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参与者还分享了他们所经历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张力。一些参与者表示，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太少。使用不同的沟通平台和不同的技术素养水平加剧了这种彼此孤立情况。许多参与者表示需要通过对话和其他群体建立更多的联系。

3.1.2 荷兰华人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

华人身份认同通常与对话环节中形成的某些规范和价值观息息相关。虽然下文会提及了一些普遍认可的规范和价值观，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参与者都认同这些规范和价值观。一些参与者拒绝统一价值观，并努力追求自己的个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价值观也可能导致荷兰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歧视和剥削。而且这些价值观也可能被用来针对这些群体。

I. 职业道德

“说实话，我刚来的时候，我的经理告诉我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这让我感到很震惊……没有工作，你在生活中寻找什么？”（关于职业道德对话的参与者）

“人们对中国人有很多刻板印象。我们勤劳、勤奋、敬业。这些刻板印象很‘积极’，但也有害。”（关于职业道德对话的参与者）

许多参与者重视勤奋工作，并为自己在餐饮业和科技业等领域的贡献感到自豪。有些人视勤奋为人生目标。然而，这种强烈的职业道德也可能导致荷兰和中国雇主的剥削，导致工资过低、工作时间过长或合同不公平。与会者强调，需要加强监管，保护移民工人免受劳工权利的侵犯。他们还指出，法律诉讼有时可能意味着职业自杀，因为工人往往不再被雇主和同事接受，尤其是在餐饮业。

II. 家庭价值观、期望和责任

家庭是对话环节中经常出现的主题，重点围绕照顾父母的文化义务展开讨论。第二代移民参与者表示，他们经常被要求定期探望父母。此外，作为独生子女⁴，许多（新移民）参与者肩负着长期照顾年迈父母的重大责任，无论父母居住在荷兰还是中国。但是，目前荷兰探亲签证的期限过短以及申请要求较高。他们建议延长签证期限、简化申请程序，以减轻照料负担。

III. 食物文化

⁴ 由于中国自 1980 年起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许多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都是其父母的独生子女。

一些参与者认为食物是凝聚人心的元素，但也有人对此不太热衷。在中秋节和农历新年等节日期间，一些人喜欢举办与美食相关的活动，以彰显文化遗产，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为了更好更快地融入荷兰社会，传统节日和饮食习惯应该让位于荷兰传统。

IV. LGBTQIA+接受度

“中国和这里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荷兰，华人 LGBTQIA+群体乐于举办活动来庆祝他们的性取向。”（参与者谈及 LGBTQIA+ 的接受度）

与会者认为，荷兰华人社区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对 LGBTQIA+群体的接纳度也普遍提高。与会者指出，年轻一代的社区成员通常比老一辈更加包容。无论是在荷兰华人社区内部，还是在更广泛的荷兰社会，LGBTQIA+社群也在积极构建自身网络，赋能 LGBTQIA+个体。然而，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在荷兰仍然遭受恐同、恐跨和边缘化的伤害，并因其华人背景和 LGBTQIA+身份而遭受交叉性歧视。

3.1.3 政治参与

“过去 100 年没有华人（政治家）当选，所以我必须投他一票。”（荷兰计划，NL Plan 名单负责人参与者）

参与者的政治参与度（例如投票、加入政党和参与政党竞选）较低。第一代移民很少投票，许多新移民没有投票权或缺乏投票知识。许多参与者表示，他们对荷兰政府和政党缺乏信任，认为华人社区没有受到重视。对于哪个政党或候选人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缺乏明确的认识。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例如，一位参与者在荷兰计划（NL Plan）的竞选团队工作，他说道，这是一个关注荷兰华人社区的新政党。尽管该党未能赢得议会席位，并据称⁵参与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制定。但是一些对话参与者也表示，该党还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尤其是来自餐饮业第一代移民的支持。

据参与者称，其他形式的低层次政治参与，例如参与抗议活动，在荷兰华人社区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他们对社会运动和社区建设工作，例如 LGBTQIA+运动和反歧视倡议，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曾给与过支持。

许多参与者有着相似的政策偏好。他们呼吁更宽松的移民政策、更公平的就业机会、更绿色的环境政策以及更严格的反歧视措施。许多参与者认为反移民和反 LGBTQIA+群体的情绪尤其令人担忧。第三次对话环节的参与者还建议政府支持少数族裔的社区活动。

第二代和收养子群体（一小部分参与者）的参与者对荷兰政治缺乏透明度、“假新闻”的传播以及民粹主义政党和言论的兴起表示担忧。

3.1.4 新移民网络的出现

“新冠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华人组织成立。我认为这是积极的发展。”（新网络参与者）

与会者指出，随着学生和专业人士等新移民的到来，新的社区组织和网络正在涌现。每个网络都有其特定的需求和议程，许多与会者同时是多个组织和网络的成员。

据参与者称，许多新移民难以融入荷兰社会，难以在其职业或学术环境中建立社会网络。一些人会根据特定兴趣或职业加入或创建新的组织和网络，例如企业家或心理学学者。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寻求更有意义的交流和支持。

⁵ https://irp.cdn-website.com/e843fd98/files/uploaded/Nederlandse_nieuwkomer_bij_de_Europese_verkiezingen_heeft_banden_met_de_lange_arm_van_China_-_Follow_the_Money_-_Platform_voor_onderzoeksjournalistiek.pdf



这些组织和网络通常并非正式成立的协会或基金会。它们基于实际需求和情感支持，并表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和脆弱性。成员在需求得到满足后往往不会再保持联系。因此，通过这些网络在社区内部建立的联系既缺乏结构性，也缺乏可持续性。

虽然荷兰华人可以使用 WhatsApp 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但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微信在社区沟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微信几乎是华人唯一用于与在中国的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其他许多常见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中国被禁用。根据参与者的经验，人们也经常通过微信与其他来自中国的移民保持联系。许多非正式组织和网络也通过微信开展工作、组织活动。

然而，这种连接方式存在缺陷。许多非正式网络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加上作为沟通渠道的社交媒体自身特征，往往导致连接缺乏深度。缺乏正式的、深入的联系也使得华人群体彼此之间难以建立持久的支持性网络。

3.2 歧视和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

“……荷兰白人认为荷兰是一个宽容、不歧视的国家，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微妙而系统的歧视偏见。”（参与者谈及歧视）

歧视显然是参与者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普遍发生在个人生活、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

3.2.1 个人生活中遭受歧视

在个人生活中，参与者面临着各种歧视，从刻板印象到公然的种族侮辱。新冠疫情期间，针对华人的歧视问题进一步恶化，许多荷兰华人社区成员（不分世代）面临着种族标签、不公平待遇，甚至被公开称为“新冠病毒患者”。

3.2.2 教育机构中的歧视和不平等

“有一次，我儿子哭着回家，因为老师说中国的生日歌是《Hanky Panky Shanghai》。他说这不是中国的生日歌。但老师说，‘这是我们在荷兰唱的中国生日歌。’”（参与者谈学校歧视）

在对话环节中，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和/或他们的孩子在小学或中学期间遭受过歧视。有些人因为说中文而受到欺凌。尽管第二代华人移民普遍会说中文和荷兰语，但他们还是会被反复询问是否了解荷兰语。有些参与者还特别提到了年幼时从中国被收养的孩子。许多这样的孩子在小城镇长大，父母是白人，所就读的学校也以白人为主，因此在年幼时经历了相当多的歧视。

3.2.3 工作中的歧视和不平等

“我在金融行业工作……我的同事当众问我‘昨晚的狗肉汤好吃吗？’”（参与者谈职场歧视）

我从人力资源部门听到这样的话：‘这个人很有能力，但是中国人的管理水平不行’。这句话对我产生了负面影响。我想知道我应该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消除这种影响。”（参与者谈及职场不平等）

参与者表示，由于他们的中国移民背景，他们不得不忍受同事们的歧视性玩笑，这导致他们感到孤立无援。一些人因为“勤劳的中国
人”这一刻板印象而面临就业权利的侵犯。他们常常被视为“临时工”，获得永久工作或职业的机会较少。在求职

面试中，一些参与者因为他们的中国移民背景而被问到一些挑战其专业知识的问题。据参与者称，这些障碍导致荷兰华裔社区的失业人数增加。由于移民如果找不到工作就须离开荷兰，因此他们的失业状况并未被纳入荷兰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这使得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更难被识别。

在对话环节中，与会者指出，亚裔女性在职场和社会环境中经常遭受基于性别和种族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LGBTQIA+ 群体的参与者也表示，他们因种族和性取向而感到被边缘化。

3.2.4 系统性忽视和缺乏支持

在应对歧视和排斥时，参与者强调了政府、雇主和教育机构支持的重要性。许多参与者由于缺乏资源和支持而感到无助。尽管年轻一代似乎更有能力应对这些问题，但中国传统的“避免冲突”和“不吵闹”的价值观往往导致他们不愿提起正式投诉。这种“不发声”还源于害怕社会性报复，或害怕被视为小题大做。

此外，与会者指出，虽然存在正式的投诉渠道，但往往效果不佳。教育机构或雇主往往不重视歧视投诉。此外，现有的歧视举报渠道往往被认为缺乏文化敏感性，无法有效处理相关问题。

方框 1：与会者提出的解决歧视和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方案

参与者强调，讨论歧视与不平等问题、提升对包容性的认识至关重要。他们认为，教育与对话是从社会层面应对歧视与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为此，参与者建议教育机构和雇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例如开展反歧视培训。

此外，参与者认为公共机构也应发挥重要作用。公共机构应负责提供有关如何应对歧视与不平等的信息和材料；同时，应提供更清晰、更便捷的歧视举报渠道，并确保相关投诉能够得到及时且有效的处理。

3.3 社区面临的挑战

对话会的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在荷兰社会面临的挑战。

3.3.1 语言和文化障碍

“中国人学习荷兰语比欧洲人难得多……对我来说，即使借助英语，也很难……我觉得自己很无能。”（参与者谈学习荷兰语）

“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 100%的荷兰人，也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 100%的中国人……我感觉自己像个外宾。”（第二代参与者关于身份认同的思考）

参与者表示，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在获取政府和行政信息方面时常遇到很大困难。根据他们的经验，许多官方文件，包括社会救助和签证申请文件，只有荷兰语版本，偶尔有英语版本。虽然一些市政当局提供其他语言的信息，但中文翻译版本却很少。参与者表示，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因为他们的数字技术能力有限，更习惯使用纸质手册而非数字资源，但是多语言版本的纸质手册并不常见。而年轻一代虽然可以使用在线翻译工具，但这类解决方案通常无法使用户完全有效地获取详细或技术性信息，导致不同人群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我们习惯在小红书（中国社交媒体应用）上查找所有内容，但这还不够。”（参与者表示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局限性）

由于语言障碍导致华人移民难以充分获得政府和行政信息，许多参与者转向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例如小红书和微信）作为信息来源。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来源使参与者难以及时了解社区活动和政府信息。

“……至少我的荷兰朋友不用像我八岁时那样，为他们的父母翻译荷兰语。我意识到一个孩子需要这样做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我们的挣扎不被人看到……这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二代参与者谈语言障碍的影响）

参与者分享了他们遭遇语言障碍的经历。根据他们的经验，语言障碍严重影响了参与者的个人生活。第一代移民通常在餐饮业工作，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参加语言课程。因此，他们常常不得不依靠子女充当翻译，一些第二代移民参与者的经历表明，这可能会给年轻一代带来压力。对于其他参与者来说，语言障碍阻碍了他们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或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学习荷兰语对许多“新移民”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尤其是在表达复杂的想法和使用荷兰语作为工作语言的时候。



除了语言障碍，许多参与者还面临着文化挑战。他们经历了一种文化二元性的状态，既想保留自己的文化根源，又想在荷兰社会中寻求归属感。这种文化边缘地带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他们不得不对当地人的文化误解和偏见时。这种“身处两个世界”的感觉会导致身份认同混乱和疏离感。一些参与者自认为是“外宾”，即长期居住在荷兰，仍然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方框 2：与会者针对语言障碍提出的可能解决方案

参与者建议开展工作坊及相关举措，帮助新来者理解荷兰的价值观，并更好地融入社会。他们还建议建立替代性的信息渠道，以弥合语言鸿沟、降低对中文社交媒体的依赖。市政层面则建议在华裔荷兰人社区成员较为集中的地区提供中文信息。

3.3.2 缺乏心理/精神健康系统的支持

在荷兰，通常需要四年时间才能找到一位精神科医生为你提供性别肯定治疗。全科医生总是拒绝将你转诊到第二阶段，其中许多人甚至有跨性别恐惧症。因此，我不得不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从香港取药。”（香港参与者谈心理压力）

“在餐饮业工作的人员（例如老板、厨师等）也是心理健康问题最严重的群体。”（餐饮业参与者谈心理压力）

“……他们建议我放松一下，或者把压力释放掉。但我的问题远比这复杂。心理医生问我是否与父母保持联系，而我每次都很难解释，我的家人不在这里，因为他们被关进了集中营。”（一名维吾尔参与者谈心理压力）

与会者还强调，拥有跨文化素养并能与荷兰华人社区有效沟通的护理人员至关重要。此外，与会者还提到，随着第一代移民退休，照顾老年移民的压力日益增大，因此需要建立适合社区的养老院，因为文化和语言障碍使得这些老年人难以入住主流养老院。

LGBTQIA+群体，尤其是跨性别者的处境尤其严峻。他们报告称，在荷兰，性别确认医疗保健通常需要等待四到五年，而作为新移民，他们在等待的过程中便无法获得必要的血液检测。在此期间，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使这些人群更加脆弱，因为他们通常每隔几个月就必须返回中国大陆或香港购买必需药物。

对参与者来说，获得心理健康相关的医疗服务尤其困难。一位荷兰注册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根据个人经验指出，心理健康问题在餐饮业从业人员和社会运动行动者群体中很常见。参与者也认同这些观点。

在第三次对话中，行动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语言障碍和文化敏感性心理健康服务渠道有限，阻碍了他们获得所需医疗服务。与会者指出，荷兰许多心理学家缺乏文化敏感性，往往对荷兰华人社区的背景和经历了解有限。尤其是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行动者指出，心理医生无法理解他们的创伤经历。这种跨文化能力的缺乏可能导致治疗无效，并导致人们不愿寻求帮助。

3.3.3 获取社会服务的障碍

据与会人员反映，荷兰华人由于语言障碍，在获取社会服务方面存在困难。文化上，“家丑不外扬”的价值观盛行，导致许多华人移民倾向于独立解决问题。

他们往往努力通过教育来提升孩子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寻求社会支持。一些参与者指出，当孩子出现生理或心理问题时，中国人倾向于自己解决，而不是寻求帮助。此外，当人们难以获取主流信息来源时，他们往往会转向中国社交媒体获取信息。

方框 3：与会者提出的改善社会服务可及性的可能解决方案

开发用于社群参与的替代性信息渠道与平台。例如，主动接触华人团体（如餐饮业协会）可以提升社群对社会福利的了解，并减少对申请福利的污名化。此外，工作坊与相关举措可以帮助新来者了解可用的信息渠道，并为他们提供实用信息。

参与者们还分享了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和荷谓自由组织的系列对话会的积极体验，感受到了荷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他们表示，这个项目帮助他们建立了归属感和信任感，并且“了解其他在荷华人正在做什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此外，这种对话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公共事务。



4. 结论

通过组织和荷兰华人社区的对话会议，本项目旨在更好地了解华人社区当前的发展情况，包括普遍存在的担忧、当前的动态以及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这些社群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中国政府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

对话环节的参与者分享了宝贵的经验和观点。虽然这些只是个人观点，但它们为研究荷兰华人社区的结构和动态提供了有益视角和有力事实。

1、多元化群体

荷兰华人社区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他们之中的不同社群是基于语言偏好、代际差异和社会背景等因素而形成的。其中一些社群甚至并不认同自己是华人，这可能会导致社区内部的张力和冲突。

目前，不同社群之间缺乏结构性联系。然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移民、学生和活动家群体中，正在形成一些新兴的网络和组织。虽然这些网络和组织的成员受益于支持和联系，但由于网络的非正式性和流动性，这种支持和联系往往难以维持。

2、歧视

歧视是阻碍华人社群融入荷兰社会的长期障碍之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取向等问题依然存在，广泛发生在个人生活、工作和教育等多个领域。

3、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也是一项融合的重要障碍。参与者认为，很少有第一代移民能够掌握足够的荷兰语，用于职场或获取信息。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社群在医疗体系中遇到困难，尤其是在心理健康领域。一方面，第一代移民因为在中国能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而对荷兰的



医疗服务抱有过高期望；另一方面，语言和文化障碍使他们难以与医疗人员（尤其是心理健康从业者）沟通。这尤其适用于那些在荷兰融合过程中遇到困难的第一代移民。此外，行动者认为他们的创伤未能得到足够理解和关注。最后，语言障碍强化了中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普通”移民的影响和操控。



5. 建议

基于以上的发现，荷谓自由主要就两个方面提出建议：首先，我们建议荷兰政府以有效方式与华人社区进行接触和互动。其次，我们建议采取措施解决对话期间提出的问题。

1. 结构性对话和可持续接触

荷兰政府与华人社区之间开展持续的结构性对话。这需要目标群体中的个人参与，也是这些参与者明确表达的愿望的途径。这种结构性对话能够让社区成员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能降低与荷兰社会进一步疏远的风险。

建立政府与荷兰华人社区之间的可持续联系，重点关注华人社区中的关键人物和组织。应联系不同社群，包括那些在对话期间未参与或参与不足的社群。可以与不同社群内现有的组织进行联系，并关注这些组织的性质和目标。这种持续的联系有助于识别结构性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在影响中国政府方面发挥作用的组织并不总是容易识别。

2. 政府参与

让政府参与与荷兰华人社区的互动变得显而易见。社会事务和就业部的直接参与被与会者视为一种新颖且积极的举措，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得到了倾听。

3. 促进举措

促进荷兰华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其目的是提高荷兰华人自力更生的能力。通过支持此类倡议，可以更有效地解决所表达的问题，并增强荷兰华人社区的自力更生、互联互通以及与荷兰社会的融合，例如，媒体平台、心理健康问题支持小组等。



4, 改善信息提供并打击歧视

提供更多更好的反歧视信息，并确保开展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反歧视培训和公众对话。建立便捷、多语种的举报渠道并培养及时有效的响应能力。此外，建议定期组织公众对话和教育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

5, 为荷兰华人社区提供中文媒体平台

中文媒体平台有助于弥合语言障碍，并对抗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此类平台可以提升荷兰社会和政治的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并提供一个不受中国政府影响的平台。荷兰社区对此类平台的需求和兴趣显而易见。

这些媒体渠道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Radio Nederland Wereldomroep 就是一个曾经成功的媒体平台的例子⁶。另外，政府还可以促进社区内自发组织的独立媒体的发展。

⁶ RNW 成立于 1947 年，提供中文新闻和信息，但不幸的是，由于 2013 年预算削减而解散。



附录 1 社区内不同群体的说明

中国学生

自 2000 年以来，约有 51% 的中国移民是留学生（Gijsberts 等人，2011）。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1990 年至 2000 年间，这一比例仅为 7%（Gijsberts et al., 2011）。这一群体相对年轻，女性比例较高（Ebberts, 2014）。其中一些学生经常参加荷谓自由组织的活动。其中一些学生经常参加荷谓自由组织的活动。根据荷谓自由的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民主和法治的支持者，并积极反对中国政府的执政措施。与此同时，另一些留学生则认可中国政府的官方叙事，这导致了两群学生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荷兰高学历华人

自 2000 年以来，荷兰中国留学生数量不断增长，因而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留在荷兰工作。许多人在技术和高等教育领域展开职业生涯。一小部分人在中国或国际公司担任外籍雇员。这一群体的政治观点与留学生相似。然而，荷谓自由的经验表明，他们在竞选活动中不太活跃。

第一代移民 (1990 年之前)

这个华人社区由 1990 年之前抵达荷兰并主要在中餐馆工作。这类移民主要来自香港、浙江和广东，以粤语为主要语言（Pieke, 2017）。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餐馆行业在荷兰的发展带动了进一步的相关移民和家庭团聚（Huang, 2023）。与学生和高学历人群相比，荷谓自由较难接触到这一群体。

第二代移民

第二代移民指出生在荷兰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后代（de Haas et al., 2019）。这一代人往往精通双语，既会说荷兰语，也会说中文或他们父母的方言（Yau, 2023）。



与主要在餐饮业工作的父母不同，他们从事各种职业，或者创业（Pieke, 2017）。这一群体不太愿意参加其他华人社群和荷谓自由的活动，尽管已经通过荷谓自由建立了联系。

LGBTQIA+

在中国大陆，同性恋曾经被严厉谴责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腐败流毒或令人厌恶的封建残余；它被视为一种需要医学治疗的疾病，或者是一种必须受到惩罚的罪行（Poon 等, 2017）。来自中国的 LGBTQIA+ 移民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寻求为性少数群体提供空间，并建立起各自的社群（Choi, 2022）。荷谓自由与这一群体保持良好的联系。

附录来源

Choi, S. Y. (2022). Global Multiple Migration: Class-Based Mobility Capital of Elite Chinese Gay Men. *Sociology*, 56(5), 946-966. <https://doi.org/10.1177/00380385211073237>

Ebbers, Mayke. (2014). *We are talking about love here: Transnationalism and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knowledge 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Master's thesis). Utrecht University.

Gijsberts, Mérove & Huijnk, Willem & Vogels, Ria. (2011). *Chinese Dutch. From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to higher education*.

de Haas, H., Czaika, M., Flahaux, M.-L., Mahendra, E., Natter, K., Vezzoli, S. and Villares-Varela, M. (201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ends,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Effec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5: 885-922. <https://doi.org/10.1111/padr.12291>

He, Q., & Colic-Peisker, V. (2024). Homeownership Habitus and Residential Practice of Highly-Skilled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1–18. <https://doi.org/10.1080/14036096.2024.2353052>

Huang, R. (2023). *Navigating the Dutch standards: Chinese restau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https://www.deburcht.nl/userfiles/file/RH_final-Navigating%20the%20Dutch%20standards%20Chinese%20restaurants%20in%20the%20NL-MA%20thesis-Rui%20Huang-final%20edition%281%29.pdf

Nuffic. (2024). *Incoming degree mobility in Dutch higher education 2023-24*. Nuffic.

Pew Research Center. (2023, December 5). *How people in Hong Kong view mainland China and their own identity*.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2/05/how-people-in-hong-kong-view-mainland-china-and-their-own-identity/>

Pieke, F. (2017).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Leiden Asia Centre. <https://ledenasiacentre.nl/wp-content/uploads/2023/04/Frank-Pieke-Chinese-influence-and-interference-LeidenAsiaCentre-Rapport.pdf>

Poon, M. K. L., Li, A. T. W., Wong, J. P. H., & Wong, C. (2017). Queer-friendly na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gay immigrants in Canad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0(1), 23–38. <https://doi.org/10.1080/17525098.2017.1300354>

Rud, I., Wouterse, B., & van Elk, R. (2015). *Stay rates of foreign PhD graduates in the Netherlands* (CPB Background Document). Central Planning Bureau. <https://www.cpb.nl/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es/download/cpb-background-document-stay-rates-foreign-phd-graduates-netherlands.pdf>

Sybesma, Rint. (2017).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0.1163/9789004263123_006.

Yau, D. (2023). *Exploring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e experiences of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Master's thesis). 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 <https://edepot.wur.nl/641896>

